

大学翻译学研究型系列教材

总主编 张柏然

翻译学方法论研究导引

Readings of Approaches and Research Metho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主 编 姜秋霞 刘全国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学方法论研究导引 / 姜秋霞, 刘全国主编.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9

大学翻译学研究型系列教材 / 张柏然总主编

ISBN 978-7-305-10527-2

I. ①翻… II. ①姜… ②刘… III. ①翻译理论—方法研究—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H059-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6509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大学翻译学研究型系列教材

总 主 编 张柏然

书 名 翻译学方法论研究导引

主 编 姜秋霞 刘全国

责任编辑 张 静 冷园园 编辑热线 025-83592123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常州市武进第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25.5 字数 672 千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0527-2

定 价 48.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83686452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大学本科翻译研究型系列读本

大学翻译学研究型系列教材

顾 问(按首字母排序)

- | | |
|-----|----------|
| 黄国文 | 中山大学 |
| 廖七一 | 四川外国语学院 |
| 潘文国 | 华东师范大学 |
| 王宏印 | 南开大学 |
| 王克非 | 北京外国语大学 |
| 谢天振 | 上海外国语大学 |
| 许 钧 | 南京大学 |
| 仲伟合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

总 序

张柏然

到了该为翻译学研究型系列教材说几句话的时候了。两年前的炎炎夏日,南京大学出版社责成笔者总揽主编分别针对高等院校翻译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与研究需求的研究型系列读本和导引。俗话说,独木难撑大厦。于是,笔者便千里相邀“招旧部”,网罗昔日在南大攻读翻译学博士学位的“十八罗汉”各主其事。寒来暑往,光阴荏苒,转眼两年过去了。期间,大家意气奋发,不辞辛劳,借助网络“上天”,躲进书馆“入地”,上下求索,查阅浩瀚的文献经典,进而调动自己的学术积累,披沙拣金,辨正证伪,博采众长,字斟句酌,终于成就了这一本本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教材。

众所周知,教材乃教学之本和知识之源,亦即体现课程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要求,甚至教学模式的知识载体,在教学过程中起着引导教学方向、保证教学质量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类高校组编、出版的翻译教材逐年递增。我们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上检索主题名含有“翻译”字段的图书,检索结果显示,1980至2009年间,我国引进、出版相关著作1800余种,其中,翻译教材占有很大的比重。近些年来,翻译教材更是突飞猛进。根据有关学者的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正式出版的翻译教材共有1000多种。^{*}这一变化结束了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翻译教材“一枝独秀”的境地,迎来了“百花齐放”的局面,由此也反映了我国高校翻译教学改革深化。

但是,毋庸讳言,虽然教材的品种繁多,但是真正合手称便的、富有特色的教材仍属凤毛麟角。教材数量增多并不足以表明教学理念的深刻转变。其中大多都具有包打翻译学天下的纯体系冲动,并没有打破我国既往翻译教材编写从某一理论预设出发的本质主义思维模式和几大板块的框架结构。从教材建设看,我国翻译理论教材在概念陈设、模式架构、内容安排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雷同化现象。这表明,教材建设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进,而如何改则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教学理念。

有鉴于此,我们组编了“大学翻译学研究型系列教材”和“大学本科翻译研究型系列读本”这两套系列教材。前者系研究生用书,它包括《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导引》、《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导引》、《当代西方文论与翻译研究导引》、《翻译学方法论研究导引》、《语言学与翻译研究导引》、《文学翻译研究导引》、《汉语典籍英译研究导引》、《英汉口译理论研究导引》、《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导引》和《术语翻译研究导引》等10册;后者则以本科生为主要读者对象,它包括《翻译概论读本》、《文化翻译读本》、《文学翻译读本》、《商务英语翻译读本》、《法律英语翻译读本》、《传媒英语翻译读本》、《科技英语翻译读本》、《英汉口译读本》、《英汉比较与翻译读本》和《翻译资源与工具读本》等10册。这两套教材力图综合中西译论、相关学科(如哲学、美学、文学、语

^{*} 转引自曾剑平、林敏华:《论翻译教材的问题及编写体系》,《中国科技翻译》,2011年11月。

言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语料库翻译学等)的吸融性研究以及方法论的多层次研究,结合目前高校翻译教学和研究实践的现状进行创造性整合,编写突出问题型结构和理路的读本和导引,以满足翻译学科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与研究的需求。这是深化中国翻译学研究型教材编写与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至今尚未引起翻译理论研究界和教材编写界的足够重视。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课题,基本上还是一片多少有些生荒的地带。因此,我们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也就多少带有拓荒性质。这样,不仅大量纷繁的文献经典需要我们去发掘、辨别与整理,中西翻译美学思想发展演变的特点与规律需要我们去探讨,而且研究的对象、范畴和方法等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独立的思考与确定。研究这一课题的困难也就可以想见了。然而,这一课题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却又变为克服困难的巨大动力,策励着我们不揣浅陋,迎难而上,试图在翻译学研究型教材编写这块土地上,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垦殖。

这两套研究型系列教材的编纂目的和编纂特色主要体现为:不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目的,而是培养学生发问、好奇、探索、兴趣,即学习的主动性,逐步实现思维方式和学习方式的转变,引导学生及早进入科学研究阶段;不追求知识的完整性、系统性,突破讲授通史、通论知识的教学模式,引入探究学术问题的教学模式;引进国外教材编写理念,填补国内大学翻译学研究型教材的欠缺;所选论著具有权威性、文献性、可读性与引导性。具体而言,和传统的通史通论教材不同,这两套系列教材是以问题结构章节,这个“问题”既可以是这门课(专业方向)的主要问题,也可以是这门课某个章节的主要问题。在每个章节的安排上,则是先由“导论”说明本章的核心问题,指明获得相关知识的途径;接着,通过选文的导言,直接指向“选文”——涉及的知识面很广的范文,这样对学生的论文写作更有示范性;“选文”之后安排“延伸阅读”,以拓展和深化知识;最后,通过“研究实践”或“问题与思考”,提供实践方案,进行专业训练,希冀用“问题”牵引学生主动学习。这样的结构方式,突出了教材本身的问题型结构和理路,旨在建构以探索和研究为基础的教与学的人才培养模式,让年轻学子有机会接触最新成就、前沿学术和科学方法;强调通识教育、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交融,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并重,注重培养学生掌握方法,未来能够应对千变万化的翻译教学与研究的发展和需要。

笔者虽说长期从事翻译教学与研究,但对编写教材尤其是研究型教材还是个新手。这两套翻译学研究型教材之所以能够顺利出版,全有赖各册主编的精诚合作和鼎力相助,全有仗一群尽责敬业的编写和校核人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两套系列教材的最后编辑工作中,南京大学出版社外语编辑室主任董颖和责任编辑裴维维两位女士全力以赴,认真校核,一丝不苟,对保证教材的质量起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在此谨向他(她)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总而言之,编写大学翻译学研究型教材还是一项尝试性的研究工程。诚如上面所述,我们在进行这项“多少带有拓荒性质”的尝试时,犹如蹒跚学步的孩童,在这过程中留下些许尴尬,亦属在所难免。作为教材的编撰者,我们衷心希望能听到来自各方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日后再版修订,进而发展出更好更多翻译学研究型教材来。

是之为序。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撰于沪上滴水湖畔临港别墅

前 言

翻译研究方法不同于翻译方法,是对翻译现象、翻译问题以及翻译方法的分析、认识、归纳、总结及预设性判断等。翻译研究发展至今,其方法论体系日臻成熟,由经验的思辨逐步转向学科理论的分析,并进而综合人文社会学科的实证性、描述性研究路径,使翻译研究逐步趋向科学化的方法论构建。

长期以来,翻译研究方法因翻译性质的认识与界定问题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过程中。

传统的翻译研究,因对翻译本质的人文性主导认识,研究范式主要体现出哲学方法上的经验主义认识基础,以及在哲学认识范式主导下的经验性、思辨性分析样式。

20世纪50年代之后,翻译研究逐步转向理论方法,运用语言学理论、文学理论、文化理论、信息理论、符号学理论、艺术理论等各种相关学科理论,分析、说明、解释并总结翻译的现实特征及其活动规律,如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对社会语境下的翻译问题和翻译现象进行审视与判断。

随着翻译研究对研究路径与研究过程提出更高要求,研究方法不断拓展,逐步引用人文社会学科的各类实证研究手段,如描述性研究、实验性研究等,翻译研究越来越趋于科学化。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翻译研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哲学思辨传统,且翻译学科具有深厚的人文特性,从经验性思辨到科学性研究势必经历一种过渡,或者说,包含一种中介范式,即介于实证与非实证的准实证研究。所谓准实证研究,一方面具有科学实证的方法倾向,如以客观材料(数据)为研究主体;另一方面运用理论思辨的研究手段,以传统的主观分析进行概括和总结,且在方法论范式上进行“观点+数据”的经验判断,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假设→数据→分析→结论”的逻辑结构。概言之,准实证研究是在理论观点的先导下寻找相应的数据说明,数据的选择具有很大程度的随意性。

准实证研究是近几十年翻译研究中较为普遍、运用较为广泛的方法范式,它将体验与事实相融合,在思辨与描述、实验等方法中寻求综合,以实现人文学科研究的人文与科学并重、主观与客观结合的有效途径。

就方法论体系而言,翻译研究在研究性质、研究范畴等各个方面已具有了多样性的发展与变化,研究方法体现出更高的科学性程度,研究方法的运用方式则体现出更加综合的交叉性特征,如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实验研究与描述性研究相结合,经验思辨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等。此外,具体的数据分析手段也经历了更为科学化的演变,如运用测量与统计分析、数据库分析等。翻译研究已充分体现出人文学科研究的综合性形态特征。

在翻译学研究方法发展和变化过程中,翻译研究中对方法的具体应用和对翻译学方法论的本体研究都对方法论的建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厘清现有的关于翻译方法论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关于研究方法的论述与研究,是翻译学方法论建构和完善的重要途径。

《翻译学方法论研究导引》对翻译学的各种主要方法的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献进行选编与介绍,以期使读者对翻译学的各种研究方法以及各种方法的研究现状有所了解。由于针对翻译学方法论的研究文献数量有限,研究者的方法论规范意识不够,论述各种具体方法的研究文献更为稀缺,现有的相关论述比较零星、不够系统,对各种方法的概念界定与特点分析都不够清晰,如功能学派、哲学学派的翻译理论研究思想仅代表了一种研究方法取向,因此,在对现有的介绍翻译学方法论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教材从中仅选出有研究文献支持和比较典型的相关方法,对其论述与研究进行介绍。囿于选文来源的限制,有些研究方法的选文内容只在部分程度上与章节分类相应,如哲学学派翻译研究方法、实验翻译研究方法和个案翻译研究方法三个章节的汉语选文,并非完全针对以上翻译研究方法进行论述,而是将以上研究方法作为某种上位研究方法的子方法进行呈现。不到之处,恳望读者批评指正。

本教材选编介绍了对翻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实证方法与准实证方法论范式的相关方法的论述与研究。

理论方法部分介绍了有关翻译的语言学、哲学、功能学、认知学和文化学等五种学派的研究方法的论述与研究,五种研究方法基本代表了不同翻译理论观照下的翻译研究的解释基础和方法路向。这些理论方法都是在“异中求同”的基础上对类似方法的整合和归纳,每种方法内部大都“同中有异”,方法内部各个分支对翻译的界定和理解不尽相同,研究方法也存在一定差异。实证方法与准实证方法部分主要选编介绍了应用翻译学研究方法、翻译实验研究方法、有声思维翻译研究方法、语料库翻译学研究方法以及翻译学个案研究方法等翻译研究中应用较为广泛的主要实证方法的论述与研究。本书每章选介两篇具有代表性的用英文撰写的翻译研究方法论选文和一篇用汉语撰写的方法论选文,力求引导读者从多维

视角了解各种翻译研究方法。三篇选文虽然不能全面反映研究方法的整体思想,但能够体现翻译研究方法的主要特征。

翻译学研究方法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形态特征,有时难以对研究方法进行泾渭分明的类属划分,如语言学研究方法包含了理论方法,也包含具有实证特征的实验研究和准实证特征的研究;认知方法既包括理论解释方法,也包括有声思维报告等实证方法。鉴于此,教材章节呈现上未作理论方法、准实证方法和实证方法的明确划分。

本教材共十章,每章包括导论、选文、延伸阅读以及问题与思考四个部分。导论部分主要介绍翻译研究方法的概念、特点、主要流派以及技术路线等;每章两篇英文选文首先对选文的主要观点和方法论思想进行导读,继而呈现选文,汉语选文以摘要加选文的形式进行呈现;延伸阅读部分提供该方法的主要经典文献,以供读者阅读研习之用;问题与思考部分基于该翻译研究方法的核心概念、主要思想及其评价等维度设问,引导读者对该方法进行深入了解和思考。

本教材编写分工如下:姜秋霞教授和刘全国博士完成了选文遴选、各章导论的撰写和部分选文导读的撰写;在读博士郭来福、慕宝龙以及青年教师尹鹏协助撰写了各章选文的导读;尹鹏老师、陈霞老师和周静老师参与完成各章选文的资料搜集;马瑞杰、冯智娇和其他研究生参与了选文的文本格式转换和校稿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翻译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基础和选文来源有限,加之翻译学研究方法论的体系尚在建构之中,本教材中对方法论的梳理和论述中或有纰漏与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目 录

第一章 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方法	1
导 论	1
选 文	2
选文一 Linguistic Models and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2
选文二 Linguistic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14
选文三 试析翻译的语言学研究	25
延伸阅读	31
问题与思考	31
第二章 翻译的哲学研究方法	32
导 论	32
选 文	33
选文一 Deconstructionist and Poststructuralist Translation Approaches: Overview and Critique	33
选文二 The Hermeneutic Approach in Translation	49
选文三 翻译研究理论方法的哲学范式——翻译学方法论之一	58
延伸阅读	66
问题与思考	67
第三章 翻译的功能学研究方法	68
导 论	68
选 文	69
选文一 The Skopos Theory and Its Functional Approach	69
选文二 Functional and Skopos Oriented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77
选文三 翻译研究的功能语言学途径	85
延伸阅读	92
问题与思考	92
第四章 翻译的认知研究方法	93
导 论	93
选 文	94

选文一	Proposal for a Cognitive Theory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A Methodology for Future Empirical Research	94
选文二	The Cognitive Study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hree Approaches	111
选文三	西方翻译认知过程研究概述	136
延伸阅读	142
问题与思考	142
第五章	翻译文化学研究方法	143
导 论	143
选 文	144
选文一	Translation, Systems and Research: The Contribution of Polysystem Studi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144
选文二	Beginnings of a European Project: Feminism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175
选文三	从研究范式看文化研究对当代翻译研究的影响	180
延伸阅读	187
问题与思考	187
第六章	应用翻译学研究方法	189
导 论	189
选 文	190
选文一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190
选文二	Process-Oriented Research into Transl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Translation Teaching	197
选文三	西方翻译教学研究: 特点、范式与启示	209
延伸阅读	220
问题与思考	220
第七章	翻译实验研究方法	222
导 论	222
选 文	223
选文一	Experimentatio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chievements, Prospects and Some Pitfalls	223
选文二	Process-Oriented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242
选文三	翻译实证研究——理论、方法与发展	254
延伸阅读	260
问题与思考	261
第八章	翻译有声思维研究方法	262
导 论	262



选 文	263
选文一 Using Think-Aloud Protocols to Investigate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Methodological Aspects	263
选文二 Think-Aloud Protocol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288
选文三 有声思维——翻译内在过程探索	303
延伸阅读	309
问题与思考	310
第九章 翻译语料库研究方法	311
导 论	311
选 文	312
选文一 The Corpus-Based Approach: A New Paradigm in Translation Studies	312
选文二 Parallel Corpu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rcultural Approach	320
选文三 双语库:翻译研究新途径	337
延伸阅读	345
问题与思考	346
第十章 翻译个案研究方法	347
导 论	347
选 文	348
选文一 The Case Study Research Method in Translation Studies	348
选文二 Case Studies in Translation: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Cases	367
选文三 翻译研究实证方法评析——翻译学方法论之二	383
延伸阅读	392
问题与思考	392

第一章 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方法

导 论

语言学是所有人文与社会学科中发育最为成熟的学科之一,在漫长的学科发展历程中,其研究方法也经历了“语文学研究方法—历时比较语言学研究方法—现代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演变过程。现代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为翻译研究方法论的科学化转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奠定了翻译研究现代范式的基础。

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是翻译研究者借鉴和运用语言学的相关理论,解释翻译现象、构建翻译模式、验证翻译假设、形成翻译思想的研究。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是翻译研究中历史较为悠久、研究内涵较为丰富、方法论较为成熟的翻译研究路径。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具有综合性强、科学系统化程度高、研究范式继承性明显等特征。

就研究方法性质而言,翻译的语言学研究具有较强的综合性特征。翻译的语言学研究不仅尝试采用语言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对有关翻译现象进行语言学理论阐释,而且也运用语言学的描写方法对翻译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同时还尝试借助语言学的实证方法对翻译文本、翻译过程和译作进行实证检验。这种多元综合的研究方法大大拓展了语言学与翻译学的“界面”(interface),为从语言学的不同层面和视角探究各种翻译现象从方法论上提供了可能。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方法的综合性特征是这一路径研究较为成熟的标志之一。

20世纪以来,语言学研究广泛借助自然科学方法,特别是数学方法,包括其逻辑方法与统计学方法,研究方法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不断提高。翻译的语言学研究运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不仅关注文本转换的形式规则和系统特征,也关注语言背后所隐藏的人类心智的认知机制,并对此进行描写。现代语言学研究方法使传统的翻译研究摆脱了经验陈述的思辨范式,奠定了翻译语言研究的科学方法论基础,大大提升了翻译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和系统化水平。语言学倡导的理论方法、描写方法和实验方法也成为翻译研究方法转型的主要方向。同时,逻辑方法、历史方法、考据方法、调查方法、比较方法、语料库方法、统计方法等具体研究方法都为翻译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论依据。

翻译的语言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继承了语言学理论及其研究范式,表现出明显的学科继承性。20世纪中叶,语言学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也日趋完善。而这一时期,传统的翻译研究面临着研究路向转变和研究范式转型的双重困境,因此借助语言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进行翻译研究成为大势所趋。语言学研究的三大流派结构主义、转换生成学派和系统功能理论等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不同的理论观照和方法借鉴,形成了三种流派的翻译语言学研究理论:卡特福德(J. C. Catford)的语言学翻译理论、奈达(E. A. Nida)的动态

对等理论和基于功能主义语言学的翻译研究理论。

受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影响,卡特福德翻译理论主张在翻译过程中,为实现等值而要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结构转换,在对比和描写的基础上,试图从结构层面归纳翻译转换的普遍规则,并对翻译现象进行解释。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对语言整体特征和共时特征的描写与分析、布拉格学派对语言结构功能的分析、哥本哈根学派对语言结构关系的描写以及美国描写学派对语言结构形式的描写和分析中运用的描写法和直接成分分析法都对翻译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转换生成语法倡导的哲学分析、比较归纳和形式化分析等研究方法的影响下,动态等值理论主张通过三阶段分析方法对翻译过程进行描写。功能语言学派则主张通过功能分析解释语言的人际功能,在翻译研究中,主张源语和目标语的功能等值。翻译的语言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继承了语言学派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论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丰富和发展。

应当指出,语言学研究在为翻译研究提供方法论借鉴的时候,在对翻译本质和学科性质的界定上与翻译学本体研究存在一定的差距。语言学的翻译研究和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是两个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概念。语言学的翻译研究主体为语言学者,他们仅将翻译作为一种言语行为、一种语言分析的个案或个别途径进行研究,试图为语言学理论寻求翻译印证,进而丰富和发展语言学理论。而翻译的语言学研究则是翻译学者借鉴相关的语言学理论,为翻译现象提供阐释依据,进而丰富和发展翻译学理论的研究行为,旨在借助语言学提供的分析工具,推动翻译研究的发展。随着翻译学研究范畴的不断拓展,翻译不仅被视为一种语码转换行为,而且是一种跨文化的书写活动,翻译的超语言特性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翻译学的学科范畴随之大大拓展,学科地位也得到提升,翻译学不再是印证语言学理论的边缘化学科,也不再是仅仅以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从属性学科,而逐步发展成一个涵盖语言、文化和美学等范畴的综合学科。其研究方法也逐步突破传统语言学派的方法论范畴,向多元整合、交叉互补的方向发展。

选 文

选文一 Linguistic Models and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Mona Baker

导 言

将翻译研究和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语言学的翻译研究旨在将相关的语言学理论在翻译领域内予以检验,而翻译学的语言学研究则致力于运用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推动翻译研究的发展。本文是一篇综述性文章,回顾了20世纪50—90年代



上述两类研究的成就及其存在的问题,论及了两种研究范式下研究方法秉承的理论依据,并部分回应近年来外界对翻译研究语言学范式的批评。

对翻译感兴趣的语言学家有 Firth, Haas, Catford 等人。Firth 提出翻译是一种交际事件,反对把“赤裸裸的思想”(naked ideas)作为衡量翻译对等的标准,认为语言的情景层面可以解释翻译行为。Haas 重申了 Firth 的观点,他不仅反对意义对等,而且也明确提出了译者在翻译中可以选择翻译单元。Catford 认为翻译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包括用一种语言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中的文本材料,其次,他提出了翻译转换类型论 (typology of translation shifts)。他的理论虽然遭到质疑,但他却是第一个对翻译的语言层面进行系统理论阐释的语言学家。

翻译学内部的语言学研究范式起初眼界比较狭窄。首先是目光主要局限于句子以下的单位,其次是认为意义和“现实”可以分开,并且可以在翻译中原封不动地转移。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占主导地位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是对特定的两种语言作对比分析,以指出两语种互译时可能出现的问题;二是不限定具体语言,试图归纳翻译的一般策略。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借助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成果,翻译语言学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翻译行为和翻译形式转换,语料库研究也为翻译转换的量化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数据支持。目前,翻译学研究已具有丰富的研究内容、多样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倾向于借用各种工具分析翻译问题,从而使得语言学研究方法和非语言学研究方法的界限不太清晰。一些主要的语言学派的研究者也借用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很难分清他们是语言学派还是非语言学派,甚至一些公然反对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学者也会使用语言学的方法。

近年来,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却成了学术界批评的对象,但大多批评均基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语言学或翻译研究语言学派的观点,而今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模式虽然尚存局限,但已扩大了研究范围,修正了研究方法。在跨学科的背景下,语言学研究方法仍然是翻译研究中最富有成效的方法,因为语言分析是翻译研究的起点,是大多数翻译研究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

1 Introduction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have had a long and productive relationship, going back at least to the late forties/early fifties, when scholars first began to discuss the possibility of developing theoretical and pedagogical models of translation in a modern academic context. In recent years, this longstanding tradition of approaching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from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some criticism within the discipline. Some of this criticism has been justified, and more recent studies have begun to take much of it on board. However, it is also fair to say that much of the criticism that continues to be leveled against linguistically-oriented work is arguably misinformed, based on a view of linguistics that was dominant in the sixties and seventies but is no longer representative of linguistics or of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This

article will trace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ally-oriented approaches from the early fifties to the late nineties, in an attempt to place the achievements and pitfalls of linguistic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in perspective and to address some of the criticism that has been leveled against it. Fawcett (1997a) offers a detailed and balanced overview of linguistic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which also attempts to trace the progress of these approaches and to weigh their shortcomings against the achievements that have been made during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following overview distinguishes between, on the one hand, linguists who have been primarily interested in trying out their favourite linguistic theory on translation because “the fact of translation is a main challenge both to linguistic theory and to philosophy” (Firth, 1956a, p. 77) and, on the other, scholars of translation whose main concern has been to promote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and who have simply looked to linguistics to provide reliable tools of analysis for achieving this end. Examples of the former include Firth (1956a; 1956b), Haas (1962/1968), Catford (1965; 1994), Halliday (1964) and de Beaugrande (1978) and of the latter Nida (1964; 1969; 1975a; 1975b), Delisle (1980; 1993), House (1977/1981; 1997), Blum-Kulka (1981; 1986), Wilss (1977/1982), Hatim and Mason (1990; 1997), Mason (1994), Bell (1991), Baker (1992; 1993; 1995; 1996b), Neubert and Shreve (1992) and Harvey (1998; 2001), among many others.

2 Translation as a challenge to linguistic theory

Generative linguists such as Noam Chomsky have never shown much interest in translation. Linguists working within the Firthian tradition, by contrast, have often devoted entire articles, and in the case of Catford (1965/1980) an entire book, to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of translation. Firth himself wrote a number of articles in which he expressed an interest in translation as a *communicative event*, pretty much along the lines of current communicative models of translation such as Hatim and Mason (1990; 1997) and House (1977/1981; 1997). In “Linguistic Analysis and Translation,” for instance, he rejects the notion of “naked ideas” as a measure of equivalence or a reference point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meaning has or has not been transferred in translation, suggesting that there is “no profit in the effort to state the total meaning of a word” (Firth, 1956a, p. 78). He expresses his position on the issue of translation in general as follows:

I want to make it clear that the linguistic systems and structures are related to the systems and structures in the events, relevant objects and people and what they are doing. You have the option of connecting structures and systems of language with structures and systems of thought or with structures and systems in situations comprising the human participants, their non-verbal behaviour, the relevant objects and other events and of these two alternatives, I suggest—difficult though as it may appear—that the situational matrix is the more manageable one and more easily related to problems of translation. (Firth, 1956b, p. 91)

Firth consistently talks about modes or levels of meaning—namely phonological, grammatical and situational (cf. Catford, 1965/1980)—and makes it clear that it is the situational level that is relevant and likely to prove productive in any attempt to account for translational behavior. Thus the emphasis on translation as a communicative event goes back all the way to the mid-fifties as far as linguistic approaches are concerned. And it continued to feature in the literature during the sixties and seventies, though this fact is hardly acknowledged today. In 1962, for instance, Haas reiterated the position outlined by Firth, though he did not explicitly refer to Firth. “What we abstract from different expressions as ‘similarity of sense’,” Haas tells us, “is a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ir functions. Unless we succeed in thus explaining translation, the mystery of bare and neutral fact will continue to haunt us” (Haas, 1962/1968, p. 104). Not only does Haas reject the notion of “correspondence of meaning” as a productive way of approaching translation, but he also explicitly states that “the translator chooses *what* units to translate,” (emphasis in original) that “the translator dealing with ‘free constructions’ constructs freely” and “the language he works in is the translator’s clay.” (Haas, 1962/1968, pp. 107 – 108) Later approaches which developed in the eighties and nineties within frameworks such as skopos theory and cultural studies have criticized linguistics for adopting a simplistic notion of “meaning” and for denying translators the freedom of choice, among other things. Such criticism, as can be seen from the work cited here, has been highly selective in its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has failed to take account of important discussions of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which originated within linguistics and which, at least for their time, were highly sophisticated. Notwithstanding her later criticism of linguistic approaches (Lefevere/Bassnett, 1990, p. 4), Bassnett-McGuire (1980/1991, p. 21) is one of the few scholar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o acknowledge the complex and essentially social view of meaning held by linguists such as Firth.

Nevertheless, it is fair to say that many linguists, even those working with the Firthian tradition, started out with similar assumptions to those of Firth and Haas in the sixties and seventies but ultimately failed to take up the challenge posed by Firth in practice. They seem in some cases to have been distracted by a self-imposed requirement to construct watertight linguistic categories for every type of translational behaviour, if need be at the expense of the validity of the emerging theoretical models. Catford (1965/1980) who, unlike Halliday (1964), attempts to account for translation as a linguistic phenomenon rather than as a method of language teaching, is a case in point. Catford’s is in fact the best known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and the one that has been widely cited to discredit linguistically-oriented discussions of translation. Even among linguists, it is now generally agreed that “Catford’s ‘theory of translation’ stands as an allegory of the limitations of linguistics” at a particular moment in time (de Beaugrande, 1978, p. 11).

Like many linguists who wrote on translation during the sixties and seventies, Catford essentially saw translation as an operation on languages, an operation which involves the



replacement of textual material in one language with textual material in another language. His emphasis throughout is on exploring the potential of language as such. Thus he relates types of translation to, on the one hand, the levels of language (resulting in the well-known categories of total translation and restricted translation, with the latter being further subdivided into grammatical, lexical, phonological and graphological translation) and on the other to the grammatical rank at which (he assumed) translation equivalence is established (leading to categories such as bounded and unbounded translation). This kind of emphasis on potential rather than actual translational behaviour is no longer favoured among linguistically-oriented scholars, and yet it would be unreasonable to dismiss it altogether. Examples of phonological translation do exist and demonstrate the relevance of at least some of Catford's categories (see in particular humorous collections such as *Mots D'Heures; Causses, Rames. The d'Antin Manuscript and N'Heures Souris Rames. The Coucy Castle Manuscript*).

Catford also developed a typology of translation shifts which proved attractive to a number of scholars, some of whom later developed their own, more meaningful typologies of shifts (see in particular Popović, 1970 and Leuven-Zwart, 1984; 1989; 1990). Indeed,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figur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eighties and nineties, Gideon Toury, has made extensive use of the notion of shifts in his own work (see in particular Toury, 1980; the notion resurfaces again in the analysis of individual case studies in Toury, 1995). Catford is credited with being the first to discuss the notion of shifts explicitly and to elaborate it in some detail. However, if we do not restrict "shifts" to changes at the structural level, as Catford chose to do, it becomes clear that the notion is implicit in any kind of comparison of source and target texts and is therefore central to practically all product-oriented descriptive work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cluding work that does not adopt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The only exception is perhaps recent work done on comparable corpora, discussed later in this entry, which compares original and translated *language* rather than original and translated text and therefore makes no use of the notion of shifts as such. At any rate, one of the many weaknesses of Catford's model is that it does not differentiate between obligatory and optional shifts (a distinction later made by other scholars such as Toury). This is precisely because Catford—notwithstanding the title of his book—is representative of a generation of linguists who have been more interested in using translation as a tool of formal linguistic analysis than in accounting for translation as a linguistic and social phenomenon.

Though heavily criticized within translation studies, it i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Catford's work represents the first ever attempt to elaborate a coherent theoretical account of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at large—rather than just literary translation or Bible translation, for instance. Divorced from the realities of translation activity in many respects and unduly restricted to the sentence as the uppermost unit of analysis, Catford's theory nonetheless has a certain elegance which derives from its own internal consistency and definitional rigour.